

(下)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文鼎中原》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郭俊民		
副主编	李庚香		
编 委	孙 鹏	崔玉山	黄寒秋
	范志军	许凤才	黄其杰

《文鼎中原》编纂人员

总 纂	许凤才			
副总纂	黄其杰	王长丰	李龙海	李志民
主要纂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丰	王 琦	王景春	王 豪
	闫根齐	刘保军	齐新卷	李 冉
	李龙海	李宗军	李 悦	李 鑫
摄 影	和来贵	雷泉涌		

序

/Order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它深深熔铸在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面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是团结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血脉和根本。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振兴一个民族，必须首先振兴这个民族的文化。

河南在古代称为豫州、中州，又因为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处中国的中部，所以又叫中原。古代的河南，长期处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生活、繁衍在中原大地上，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均发源或发达于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农业发展方面，人类从吃“虫兽果蚌”到吃“粟黍牛鸡”，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中原的农业耕作制度始终居于中国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宋代的程朱理学，中原地区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萌发和荟萃之地；在科技发展方面，从商代的司母戊鼎到汝钧官窑的瓷器，从张衡的地动仪到郭守敬的观星台，从造纸术的发明到火药的广泛运用，中原文化一直都走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前列。灿烂的文化、厚重的历史孕育出了灿若星辰的历史名人。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秦汉魏晋时期的李斯、商鞅、

杜诗、桑弘羊、司马懿、谢玄；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岳飞、吴道子；明清时期的朱载堉、李诚，等等，这些名人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他们引领风骚数千年，在中国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谱写了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优秀篇章。

悠久厚重的中原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全省现已查明的有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3万余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各类可移动文物约140多万件。全省现有189处（198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9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500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2处世界文化遗产，有8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20个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镇）。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就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4座。全省不仅遗存着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保存着内涵丰富、独具中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文学、社火，特别是少林功夫、太极拳、马街书会、朱仙镇木版年画等，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在中原的广大地域内，至今还遗留和传承着许多古老的民间习俗和富有地方特色的乡土工艺，被专家、学者称为“活化石”、“活文物”。如，淮阳“人祖庙会”、“泥泥狗”，源于唐宋时期的开封汴绣，以及宣和风筝、唐三彩、汝瓷、钧瓷、皮影艺术等，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据着一定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的价值正日益被社会所认识，被世人所关注。党和国家把“文化软实力”建设逐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形势下，省第八次党代会也提出了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实现中原崛起的战略任务。随着文化强省建设战略的实施，我省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已经驶入了快车道。在戏剧表演艺术方面，成功创排了大型情景交响歌舞剧《木兰诗篇》、功夫舞剧《风中少林》、歌舞剧《清明上河图》、舞剧《河洛风》等文艺精品剧目，提高了河南的艺术品位和知名度；一大批精品剧目，如大型古装豫剧《程婴救孤》、现代豫剧《村官李天成》、现代曲剧《飘扬的红丝带》等连获国家大奖，并唱响大陆各地和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河南风”。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厚重内涵的中原杂技艺术、文物展品风靡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省豫剧二团排演的大型古装豫剧《程婴救孤》将到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巡演，这是我省豫剧首次在欧洲国家演出，

可以说这是豫剧对外文化交流的新的里程碑，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文学、书法创作方面，出现了二月河、张海等一批文化名人。在文化活动开展方面，以祭拜黄帝为代表的祭祖文化，姓氏文化、龙文化等红红火火。在文化旅游活动中，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风靡全国，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穷魅力逐步显现出来，已成为我省旅游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一大批文化产业项目落户中原，文化产业增加值近三年翻两番，文化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正成为带动河南经济发展的有机力量。可以说，今天的中原大地，正日益呈现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气象。让中原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原，已经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心愿。

文化凝结历史，文化连接未来，伴随着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原崛起提供强大动力，为中华文明作出新的贡献。面对新世纪，实现中原崛起，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认识中原文化、了解中原文化。只有在认识中原文化、了解中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挖掘中原文化，才能从单纯保护的状态中走出来。基于此，我们按照典型、有代表性的原则，摘取我国历史上发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古迹、历史名人，以及重要自然风光等，以现在行政区划为单位，把中原文化的精髓呈现给广大读者，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领略到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学识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在编纂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再版时改正。

河南省文化厅厅长 郭俊民

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之阳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 5000 年前，“五帝”之一的颡顼及其部族曾以此为都，故有“颡顼遗都”和“帝丘”之称。历史上濮阳曾几度易名，夏代叫昆吾国，春秋时期为卫都，秦代设置濮阳县。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市商繁荣、农事发达的地方。各个朝代均在此设郡县、置州府，先后称澶州、开州，中华民国时期复名濮阳。千百年来，这里名人辈出，史事纷繁。华夏祖先颡顼、造字圣人仓颉、巾帼诗人许穆夫人、兵家之祖吴起、一代名相商鞅、天文学家僧一行、治黄名师高超等历史名人均诞生和生活在这里。

濮阳地处中原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古战场之称。以弱胜强的晋楚“城濮之战”、孙庞斗智的“齐魏马陵之战”，打了胜仗又订“澶渊之盟”的“怪战”等都在这里留下了遗迹。1986 年，境内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三足陶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证明了七八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1987 年在濮阳西水坡出土了距今 6400 多年的珍贵文物“蚌塑龙形图案”，把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史向前推进了 1400 多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濮阳为“中华龙乡”。造字圣人仓颉曾在这里创造文字，结束了中华民族结绳记事的历史。现存各类文物古迹 276 处，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濮阳成为抗击日寇的战场，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杨得志等革命家先后在这里运筹帷幄，大大推动了民族解放的进程。

► 戚城

濮阳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戚城遗址是濮阳悠久历史的重要见证。戚城文物景区总占地面积 760 亩，自 1991 年 3 月起，历时 5 年建成，其中有纪念景点 5 处，文物及遗址展示 3 处。戚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上的部分为周长 1520 米的古城残垣，占地面积 1440 平方米，地下则保存着自 6000 多年前仰韶文化到汉代等不同时期历史遗存。

戚城会盟是春秋时代重要的历史事件。会盟台便是春秋诸侯会盟举行仪式的高大的土台建筑。会盟盛行于春秋时期，当时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一种具有制约作用的礼仪活动。会盟各方协议达成后，在会盟台上对天盟誓，然后杀牲取血，饮血坎牲，对神灵做出信守诺言的保证。主持会盟者叫盟主。那时，盟主多半凭仗自己的实力，打着“以德服人”、“抑强扶弱，辅佐周室”的旗号来发号施令。据《春秋》、《左传》记载，从公元前 626 年到公元前 531 年的近一个世纪内，诸侯在卫国会盟 14 次，其中在戚城就有 7 次，内容牵涉结盟、背盟、续盟、援救被侵国家等事宜。

作为历史名城，戚城究竟毁于何时，史籍上目前还未找到确切记载。或许随着卫国的灭亡，秦嬴政统一天下，戚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由盛而衰，由衰

而崩塌、消失也未可知。濮阳建市之后，出于对濮阳历史遗迹的继承与保护的考虑，重修了戚城，并定名为“戚邑”，成为以文化古迹为主要内容的参观游览胜地。然而，在“戚邑”之中，也就是在戚城的西南角处却真有一座土砌的城垣遗址。当时修建戚城时，有人认为这座城垣遗址就是戚城，从而定下了重修“戚邑”的位置坐标。那么戚城与目前这座古城遗址是否是一码儿事呢？

戚城公园内的城垣名叫“孔悝城”，早在 1963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就考察并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垣前还立了“孔悝城遗址”的碑。对于这座城就是孔悝城这一点，至今未有任何争议。

戚城公园



然而，孔悝城为何又变成了戚城呢？这是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失误造成的。濮阳市文物古迹的权威出版物《濮阳古今谈》一书中，首将两座城混为一谈，在《已圯的东周北方重镇——戚城遗址》一文中这样写道：“戚城，即春秋时期卫国的主要城邑——戚，也称孔悝城，是卫国权臣孙昭子的封邑。”正是基于“戚，也称孔悝城”这一结论，戚城与孔悝城便变成一城，并且把戚城修建在了孔悝城遗址上。

要阐明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一个发生在当时卫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卫灵公的妻子南子是个远近闻名的漂亮风骚女子，她在出嫁前，就与宋国的风流公子宋朝有染。

卫灵公的独生子蒯聩本来就与南子不和，听说此事更加咬牙切齿，发誓要杀南子，以雪国耻。但事不遂愿，事情败露，蒯聩只好逃离卫国。公元前493年，卫灵公死，蒯聩的儿子辄继位当了卫国国君，因其父逃亡在外，因而称卫出公。

蒯聩听说儿子继了位，大为恼怒，便在晋国大将护送下，趁黑夜悄悄潜回了卫国，并在戚城藏身达13年之久。公元前479年，蒯聩图谋已久的复位计划终于成熟了。

蒯聩有个姐姐叫孔姬，生有一子叫孔悝，当时孔悝是卫国的宰相。孔姬丈夫早逝，便与自己年轻英俊的男仆浑良夫私通。蒯聩便抓住这一点来贿赂并威胁浑良夫，说如果帮他复位，便让他做高官，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孔姬为妻。于是浑良夫便将蒯聩扮成女人混入了孔悝城。在孔姬的协助下，他们挟持了孔悝，并强迫他盟誓，共同推翻卫出公，帮助蒯聩复位。子路就是在这一政变中“结缨而死”的。蒯聩政变成功后，将独生子赶出卫国，登上国君宝座，史称卫庄公。

孔悝是卫出公的宠臣，而孔悝的封邑、住地即孔悝城。蒯聩与卫出公虽说是父子关系，但却是政治上的死敌。蒯聩无时不想推翻独生子而重掌国印；独生子也不示弱，不但坚决拒绝还政于父，而且还亲自率兵攻打过父亲。

蒯聩最终夺取政权的手段，是孔悝母亲乘黑夜潜入孔悝城，挟持了孔悝而得手的。因此，戚城与孔悝城绝不可能是一城。如果两城本是一城的话，那就是说，蒯聩在孔悝家里隐藏达13年，而孔悝却全然不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水经注》是我国最古老、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水系地理书籍。该书不仅对中国的大小河流的发源地、流向、流域、终止地都进行了详尽描述，而且对各流域内的重要文化古迹均进行了考证与记载。书中就有对濮阳古戚城的描述：在“戚南河北岸，有古城，戚邑也”。

《水经注》的作者酈道元是一位严肃的地理学家、人文学者，也是一个旅游探险家。许多大河山川他都亲自前往作过实地考察，沿河流域的文化古迹也大多经过他的考证。然而，对戚城古迹酈道元却是作了“道听途说”式的记载。书中的那段文字转述于晋代学者杜预的文章。杜预是著名的《左传》注解学家。在他对《左传》的注疏中曾对“戚”这个重要的城市作过“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的注解，而酈道元就将其录入了自己的著作之中。这是一个只有南北坐



戚城风光



精美建筑



公园一角



戚城子路墓

标，而无东西坐标的方位图，因此，就造成了后人无法确切知道戚城位置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其中也使我们了解到，戚城早在酈道元成书的后魏时期就已经不存在了，甚至连遗址也荡然无存，否则酈道元就不会从别人的文章中去摘抄那一两句话来描述这座古城。中原地带没有险要地势，濮阳又是重要的南北通衢，以旅行家身份，酈道元是会亲自来考察一下此城的。

自酈道元之后，戚城从人们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近 1000 年。到了明朝正德二年，直隶指挥使认定现在的“子路坟”就是当年埋葬子路的地方，便在此地修庙立碑，并广植松柏，从而使这里成为开州胜景之一。时间过了 80 余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子路家被再次扩建修葺，濮阳籍的大学者、一代名臣董汉儒受托写了一篇《重修先贤仲子墓祠记》，在这篇文章中，为了确定子路坟的位置，董汉儒再次提出了戚城的所在地。他说，据旧志记载，子路坟一共有三座，一座在清丰县，一座在长垣县，而另一座则在开州的戚城东门外。这样，戚城与子路坟的所在位置就成了一个互相印证的连带关系。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子路坟的确切位置到底在不在这里？即使在这里，说它在戚城东门外是否有真实可信的依

戚城遗址



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子路坟的修葺经过。据董汉儒自己说：“吾开有仲子墓，旧无祠宇。正德丁卯……嘉靖、万历间……相继修葺。”也就是说，子路坟原来并没有庙宇、石碑等纪念物，有的仅仅是一个大土堆。到了明朝正德二年才为子路坟增设了一些纪念物。而接下来，根据旧志记载，子路坟共



戚城遗址

有三座，哪座是真，哪座是假，没有人能说得清。据董汉儒判断，濮阳是子路结缨而死之地，想必是真子路坟。同时，整个事件发生在戚城，而戚城附近确有这么大的坟茔，想必就是子路的坟茔。所以，这一切都是推断、猜想，并非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

1966年，如火如荼的“文革”席卷濮阳。破“四旧”的红卫兵没有忘记子路坟，他们推倒碑石，敲烂石羊、石马，将子路坟挖开了一个大洞。结果，所谓的子路坟只是一个大土堆而已，里边并没有什么遗物，甚至连传说中的衣冠冢也不是。这说明董汉儒的判断是错误的。既然子路坟的位置不可确定，那么，以子路坟为坐标来判断戚城的位置当然就更是错误的了。

董汉儒是濮阳籍最著名的大学者，他确定了子路坟位置，并认定子路坟在戚城东门外，显然就成为后世对这两处古迹的位置的权威定论。然而，在旧志中，也有不同意董汉儒观点的。《开州志》中就记载说：“戚城在州比、王合里，距州七里。”这个记载约比董汉儒写的《重修先贤仲子墓祠记》早50余年。主持修撰这本《开州志》的也是濮阳籍学者，他叫王崇庆。

这里说的“戚城在州比”这个“比”字疑为是“北”字之误。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戚城的南北坐标应在濮阳县北城墙以北3.5公里处，而东西坐标则在“王合里”。目前，胡村乡以“王合”为名的村子有4个之多，而在明朝时的“王合”是指哪一个呢？这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濮阳县

濮阳县地处华北平原，黄河下游北岸，位于河南东北部，是濮阳市的南大门。

濮阳县是一个拥有 5000 年古老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礼记》中就有“桑间濮上”的记载，上古五帝中的颛顼、舜帝及其部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素有“颛顼遗都”、“帝舜故里”之称。战国时期因城址位于濮水之阳，故称濮阳。

濮阳县自然景观宜人，名胜古迹繁多，有象征濮阳县历史地位的中心阁古代建筑杰作——八都坊；宋真宗“澶渊之盟”回銮碑；有高阳城、戚城、碱城、鹿城、德胜城、帝舜故里等古城址；瑕丘、仲子墓、团盟等文化遗址。有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旧址等。特别是 1987 年在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蚌砌龙”，把中国龙的图腾向前推进了千余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濮阳县也因此而被称为“龙乡”。

濮阳县居中原要冲，扼河朔重塞，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著名的古战场之一。商灭夏的“昆吾之战”、春秋晋楚的“城濮之战”、晋郑的“铁丘之战”、秦末的“项羽章邯之战”、汉末曹操吕布的“濮阳之战”、五代晋梁的“德胜之战”、宋辽的“澶渊之战”均发生在濮阳县境内。在近代史上这里又是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和中心，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战斗。陈毅将军留下了“我行未已过濮阳，驻马凭吊古战场，能掷孤注寇莱好，退避三舍晋文强”的光辉诗篇。

► 濮阳旧城

说濮阳城“绝无仅有”，是指濮阳旧城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濮阳旧城是由南北两个姊妹城组成。现存的濮阳县城是姊妹城中的北城，距北城向南约1公里处还有一个南城。两城分别叫德胜南城和德胜北城。两座城的建筑形式十分特别，均呈半圆形，中间夹了一条黄河故道。因黄河在此地有一个渡口称“德胜渡”，濮阳旧城因此而得名。

据濮阳旧志记载，黄河经濮阳县境有两条河道。其中一条自滑县流入北，经开州之小屯庄、张家庄等村，经戚城西，转而东北入清丰界。这是西汉以前的旧黄河故道。西汉武帝时，黄河在濮阳境内决口改道，黄河从濮阳县现在的南城墙外流过。目前，濮新公路南仍留有大面积的低凹地、成片的沙丘，这就是西汉以后的黄河故道。到了北宋淳化四年，即公元993年10月，黄河再次决口改道，将南城彻底摧毁，黄河才向南滚动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河道位置。

大唐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上进入了最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朝代。后梁建都于开封，自公元907年“建国”到公元923年被后唐灭亡，先后统治中原16年。在这16年中，后梁与后唐在濮阳一带争夺中原及黄河要津——德胜渡的战争就长达11年。后唐李存勖为彻底控制河津，于贞明五年派族弟大将李存审于德胜渡南北筑两城守护，谓之夹寨。此举为他击溃后梁军，最终建立后唐王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濮阳城建城的最初原因。出于控制黄河渡口这样一个战略的考虑，濮阳城被建成了两个半圆中间夹一条黄河的独特样式。到了北宋淳化四年，即公元993年，由于黄河决堤改道，南城一夜之间被摧毁，黄河不再

庙会





濮阳历史街区

流经原河道，德胜渡口也不复存在，“夹寨”的战略意义已全部丧失。因而，被黄河毁掉的南城便再也无人去修复它了。濮阳城的姊妹城在历史上便永远消失了。

从历史资料看，当时濮阳南北两城共存时，南城战略价值高于北城。因为后梁的都城在黄河南岸，梁、唐两军交战也多在黄河南岸，如果有

一天能找到南城旧址，并进行适当挖掘，相信定会有所发现。

南城毁后，军政、经济均移于北城。北宋时，濮阳城成为抗击契丹入侵的重要战略堡垒。宋真宗皇帝曾在宰相寇准的陪同下，御驾亲征到濮阳，并登上北门楼亲自指挥抗击契丹。宋军因此而大获全胜，并在濮阳与契丹定下了“澶渊之盟”，从而使北宋与契丹之间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状态。

明、清两代，开州依然是战略重镇和兴学重教之地。地方官对濮阳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修整，使得濮阳城成为北方少有的巍峨城池。城有四门：南开德、北镇宁、西阜安、东得胜。城东南、西南两角各有一塔，东文峰、西配文。文峰塔底座直径约20余米、高7层，蔚为壮观。城内除现存的中心阁与御井外，还有古迹几十处。有东文昌阁、西文昌阁、明道书院、文庙、魁楼等，还有鼓楼、披云楼、濮阳楼、爱景堂、八都坊等大型建筑。城内还有以西湖为主的重要名胜，如碧瑶亭、仙山亭、观鳧亭、疗鹤亭等。后多毁于内战及日寇侵华时期。

濮阳老城如果能不遭破坏地保存下来，称它为一个“文博物院”，恐怕也毫不夸张。当时的濮阳城面积大约有9平方公里，但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城内却有庙宇29座，祠3座，书院、文庙等与文化相关的建筑7座，政府机关建筑8座，与城防相关的建筑6座，塔两座，此外还有大小牌坊144座。这不是一座大型“文博物院”，又是什么呢？濮阳老城门以东、西、南、北4个城门为点，形成东西与南北两条中轴线，其交会点就是现在的中心阁。整个城市因城墙与两条中轴线的自然分隔而形成“田”字，在“田”字的4个方块中是四大功能区：施政区、宗教区、教化区、游乐饮玩区。但是，这4个功能区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

义、互为关联的。

在两条中轴线大道上，跨街安排着百余座牌坊，如东街的“百代流芳坊”、西街的“群英萃美坊”、南街的“聚魁坊”、北街的“八都坊”等。这百余座牌坊，绝大多数是因濮阳籍晋官加爵而立的。如“八都坊”是明代朝廷为表彰八位在明朝为官、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官吏而立的。而有一些则是在朝为官的人死后，其后代向朝廷申请，得到批准后自己掏腰包立的。这一类牌坊在官爵牌坊中也占一定数量。其他类牌坊有“孝行坊”、“及第坊”、“贞节坊”、“烈妇坊”等。不同的牌坊，要经不同级别的官府批准，并报朝廷礼部衙门备案。可以设想，在总长度只有6公里长的街道上树立上百座牌坊，无疑会对当时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一种无声的约束与引导，代表的是当朝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的思想，它们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政治教化之外，我国封建帝王重视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文化教育了。在濮阳老城，除大户人家请先生设馆教书之外，官办教育机构也较发达。公办学堂有学宫、明道书馆、明伦堂、东文昌阁，图书馆有慈云阁、文昌阁，而文庙、魁楼等向孔夫子施礼膜拜之处当然更是必不可少的。上述教育机构主要分布在城东，从而使其成为濮阳旧城的文化区。直到现在，濮阳县的几所主要学校仍在县城东部，算得上一脉相承吧。

濮阳旧城的施政区主要分布在南北中轴线的两侧，主要有州府衙门、吏目署、都司署、协镇署和练军营园。而城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则分别是濮阳的游乐区与宗教区。在西北部有大士庙、元武庙、财神庙、三皇庙，甚至还有火神庙和太山庙。整个濮阳城有大小庙宇29座，但这里最为集中。在这里还有一座“五爷庙”，不知被祭祀者为何人，查遍资料也不知谁是“五爷”。

濮阳西南部的西湖是很值得一提的。这里因修城墙取土而形成了一个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的城内湖，一年四季碧波荡漾。在西湖四周有濮阳楼、披云楼、瑶碧亭、仰山亭等建筑，是供文人墨客登临赋诗作词的绝佳之地。因此，一些濮阳籍名士在此地留下了大量的诗赋，并为西湖总结出“西湖八景”，如西湖秋水、东寺晚钟、披云胜景、慈云夕照等。

濮阳旧城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峰、配文二塔。这两座塔的奇特之处是它们分别建于濮阳城的城墙西南与东南两角之上，很像北京故宫城墙上的角楼，但它们又远比角楼高大得多。文献记载它有7层，加之又是在城墙之上修建的，其高度可想而知。一般塔的建造与宗教有关，但文峰、配文二塔初建时主要用于军事。

说不尽道不完的濮阳城。它的城市规划之科学、建筑之精美、古迹文物之繁多是其他同类旧城所无法比拟的，但它命运多舛，屡遭劫难。城中庙宇多毁于冯玉祥将军之手。他手下的军队所到之处拆庙驱僧，视宗教为迷信，把僧、尼当成寄生虫，将数百名僧、尼遣送回家。现如今，中心阁是这座名城中唯一幸存的古建筑。



濮阳县黄河湿地

► 中华第一龙

1987 年对濮阳市来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濮阳市政府从安阳全部迁到濮阳，为了保障这个新建城市的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市政府决定在濮

阳县城内的西南角——人称西水泊的地方开挖一个约 1 平方公里的蓄水池，以引进黄河水供应城市。按照规定，市文化局先行到位，进行探方发掘。该工程由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孙德宣负责。文物考古人员用洛阳铲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探挖，结果一无所获。

经过五天探方，考古一无所获，考古人员准备撤离，就在此时，不甘心的孙德宣在规划的探方外又下了一次洛阳铲，就是这“多此一举”的一个意外，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诞生了。恰好，这是 1987 年的年底，再过几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龙年。“中华第一龙”此时出土，似乎在刻意地为龙年献上一份厚重的

中华第一龙碑

的礼物。

一个身材伟岸的男性尸骨旁，用贝壳摆塑着龙、虎和其他图案。按照中国四象之说，有四种动物分别指示四方，它们分别是：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或又称作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在一具尸骨旁，用贝壳来摆塑这些复杂的图案，仅仅是为了指示方位吗？这位被龙虎簇拥着的人物，生前是做什么的，或者他是谁？此人死于何年何月？一连串问题无法弄清楚。所以前来勘察的专家们三缄其口，而当时相对闭塞的出土地点和不发达的媒体，使这个本来就充满神秘的墓葬，越发云遮雾罩起来。

龙，作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物体，与其说它是物质的，毋宁说它是精神的。龙是一种精神产物。在远古，它是华夏联合部族的图腾；在近古，它是一种象征；在现代，它是一种文化载体。一种国家、权力、精神统治和民族的象征，是一种民族传统、习俗和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因此，自古至今，龙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无所不能的威力和能量。

民间对于龙的认识最主要的还是与水联系在一起，农历中有“龙治水”之说，

二龙乃至九龙治水的年份有可能雨水偏多或偏少，种庄稼时就要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了。民间的“龙王”也是管水的，管江、海、湖、河，也管上天的水。二月二龙抬头，从这个节气开始，春雨就要变多、变勤了。在民间，龙王爷的地位可是不低，中华民国前，又有哪个地方没有龙王庙，百姓不拜龙王呢？说起龙王，或许没多少人知道，这位神仙被道教奉为天尊，而它的初始却源自佛教，在鸠摩罗什自印度翻译的佛教典籍《妙法莲花经》中首次出现“龙王”一词，该典籍中记载有8位龙王。大约是以此为蓝本，中国人由此演变出了龙生9子：长子赑屃、次子螭吻、三子蒲牢、四子狴犴、五子饕餮、六子八夏、七子睚眦、八子金猊、九子椒图。9个儿子习性、爱好、能力各有不同，因而其归宿下场各不相同。长子形似龟能负重，所以被安排驮碑；次子似兽，好登高望远，所以被安排在宫殿屋脊上；蒲牢喜欢吼叫，所以被安放在钟、铎上当吊环；狴犴像虎，孔武有力，所以被安排在监牢门口威慑犯人；饕餮好吃，所以被安排在鼎上；八夏爱水，所以被安排在桥栏上守望；睚眦性好杀，所以被安排在刀柄上；金猊像狮子，因为喜欢播烟弄火，所以被安排在香炉上；椒图性格孤僻，终日关门闭户，所以被安排在大门上吊门环。

相对民间文化界对龙的认识就要复杂许多了，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这样刻画龙的形象：“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其光也，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无则精以和、动作则灵以化，於戏。允哉！君子群神也。”这是古代典籍中对龙最生动形象的描绘，在刘向的笔下，龙是无所不能的，这一点与民间对龙的想象是大致相同的。从龙的种类来说，文人们又将其细分为可驾的马龙、身有双翼的应龙、四象学说的青龙、可升天入地的毛龙、懒不做事

濮阳县出土的贝壳龙虎图





中华第一龙

的垂龙、可喷烟吐火的火龙、长角的虬龙、无角的螭龙、兴风作浪的蛟龙、颌下有珠的𪊑龙、变化多端的蛰江龙、跛脚的蹇龙。

从上述龙的“种类”来看，文人心目中的龙，形象、特征、个性、职能等等都要复杂许多，这大概跟文人的思想本身就比较复杂有关吧。但这远不是文人对龙认识的全部。龙在文人心目中既是具体的、生动活现的；又是抽象的、神秘朦胧的。在中国最深奥神秘的古代典籍《易经》中，龙的形象是上天预兆，它代表了天道、地道与人道。

龙的话题在文人笔下说龙、崇龙、戏龙、学龙、玩龙、唱龙者浩如烟海，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乃斌先生甚至做过这么一个统计，在《全唐诗》中，龙字共被使用了3863次，足见龙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无论文人笔下的龙，还是民间想象的龙，他们和濮阳的中华第一龙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龙并不存在。龙是精神象征物，龙是图腾，龙是中华多民族综合体的联合图腾。

濮阳可能是华夏民族真正的诞生地。黄帝部落依托最早的农耕文明崛起于黄土高坡之时，黄帝和他的部族只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有熊氏部落，还不能称其为华夏族。直到黄帝部落与苗族、黎族、羌族等多个民族相融合，并取各部族图腾的一部分而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图腾——“龙”时，真正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才诞生了。“中华第一龙”出土于濮阳，那么，在没有更新的、更早的龙图腾被发现之前，濮阳就可以被认为是龙图腾的最早诞生地，即华夏民族的最早诞生地。

龙是图腾，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濮阳因出土了“中华第一龙”而成为无可争议的龙乡。“中华第一龙”不仅证实了濮阳有长达6000多年的文明史，而且证实了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产物，濮阳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见证地。

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何以创造出这样一种神奇的形象作为自己的图腾，甚至视为祖先呢？濮阳西水坡发掘出的“中华第一龙”，造型生动优美，令人叹为观止。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时间最早、造型最完美、形象最接近现代龙的艺术形象，是我们研究华夏民族图腾的最直接依据。假如我们把这条龙肢解开来，就会惊奇地发现，它是几种动物的组合体：牛头、鹿角、蛇身、鱼尾、熊爪。

中国历史研究会195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中国中部黄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区。住在周围的各民族都想迁徙进来，因此，那里成了各种族斗争的舞台，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场所。”“最早进入中原的是羌族、黎族和